

精品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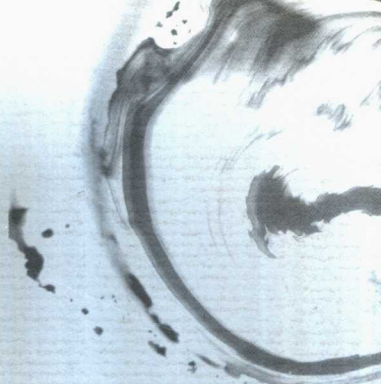
文化译丛

电视

〔英〕罗杰·西尔弗斯通 著
陶庆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与日常生活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电视
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
扮演着
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
对这一角色的理解
总是存在
各种各样的偏差？

与日常生活

电视

—英二罗杰·西尔弗斯通 著

陶庆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与日常生活/(英)罗杰·西尔弗斯通著;陶庆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文化译丛/李陀主编)

书名原文: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ISBN 7-214-03739-4

I. 电... II. ①西... ②陶... III. 电视-传播媒介-研究
IV. G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5254号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Copyright ©by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Copyright ©by JSPPH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ion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3-042

书 名 电视与日常生活

著 者 [英]罗杰·西尔弗斯通

译 者 陶庆梅

责任编辑 蔚 蓝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40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2

字 数 186千字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739-4/G·1366

定 价 19.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媒介理论的著作。但并不是脱离实践的理论书。在本书中,我试图以研究实践为基础,并通过从中折射出的镜头,探询电视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它带给日常生活的意义。我希望,在经济与社会研究会所支持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研究项目中,在对媒介与信息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不断推进的研究中,这本书将是这一系列卷轴中的第一部^①。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研究课题中第一本独立的研究成果,是一本关于理论并且是在理论内部研究的书,以及我为什么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资料合成——这是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一个文本中。答案不会很简单。在个人的层面上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我图一时的方便,而且准备得也不够充分,另外还有我的学术偏好(我是个顽固不化的理论家)等因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林德勒夫和梅耶(Tom Lindlof and Timothy Meyer, 1987)所注意到的,社会学研究最显而易见的长处之一,就是它有创建新理论的能力:特别是创建一种以社会进程为基础的新理论,并且,这种新理论反过来又要解释社会进程,以此理解生活中的各种关系。

① 严格说来本书已是第二例,在此之前已经有《消费技术:家庭空间中的媒介与信息》,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和艾瑞克·赫希(Eric Hirsch)编,1992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也是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其自身也是不断变动着的；它把各种资料分析填充进去，经受这些资料的挑战，并且被资料所修正。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本书只能暂时说明正在形成中的立场；但不应该就此就把它看做没有价值。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对时下关于电视与它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地位的论争有所裨益。

当然，电视既是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与意义的中介，也是施加给日常生活的权力与意义的中介，但要理解这里的权力与意义，不能不关注媒介之中多种复杂的内在关联，以及媒介所参与的各种层面的社会现实。我们要把电视看做是一种心理形式、社会形式和文化形式；同时，它也是一种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我们不要只把媒介理解为影响之源，它既不是简单的有益，也不只是有害。我们应该把电视嵌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话语中。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话语是什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互为界定的，它们是如何编织在一起，以及最关键的，它们是如何依据相互之间的影响而区分开来的。要完成这项描述和分析的任务，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在这本书中，我尝试着一方面仔细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动态(dynamics)所在，另一方面也对日常生活的政治(最广泛意义上的)作理论描述；也许从这里能够找到一条有效的道路。

早些时候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延续到了这本书中(特别是Silverstone, 1981)——虽然问题看上去不太一样——只要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尽管在方法论上二者相差很多，但这本书延续了早期著作中的主题。不过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我希望这些差别标志着我更敏感地认识到电视的地位在当代生活中的自相矛盾之处。的确，即使问题的构成是不一样的(即使在不同

的时期我对问题的构造是不一样的),但问题始终是一样的:生活中媒介的权力和反响在所有的社会综合体中——尽管是参差不齐的——把对世界的认识连接在一起,并且限制着我们影响和控制其意义的能力;但是,它也同样提供着一些要素,我们能利用这些要素构造我们自己的意义,通过这些意义(尽管同样参差不齐)产生批判、超越和改变它的原材料。

贯穿在以下讨论中的,甚至是与媒介终生相伴的,是“必要的张力”(essential tension)。我在试着把我想说的说出来的时候,这个词差不多是自动冒出来的。它指的是社会现实核心中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媒介变幻莫测与它的位置固定不变之间;表现在自由和限制、主动和被动、公众和私人之间;表现在行政的强制力和个人的行动、历史的定位和融入当代日常生活话语的相互交叉之间。任何一种本质的判断必须要放到这种语境里加以考察。这种本质主义并不吁求一个不变化的社会或政治现实,它也不是要把问题简单化。它承认——对此我没什么好抱歉的——社会生活,它所有的表现,本质上都是处于持续的、具有生产性的张力中(参见 Murphy, 1972)。

我试图把这些虽然不稳定但却具有强制性的张力中的某些要素具体化。它们多种多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很脆弱。如果要顶住现实的挑战的话,理论必须是多元的和开放的——具体地讲,就是它要适应具有自相矛盾之处与破碎性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本书中,我要分析它多层次的结构,展现复杂的各种关系及其不断变化着的过程:作为媒介的电视,作为技术的电视,被规则建构和约束的电视,以及在持久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电视的角色和它的仪式性。我认为它们在内在联系上呈现出某种母体形式(the form of a kind of matrix):它们通过

本体的各个层面和个体的心理、家庭与郊区的空间、工业和技术的结构——所有这些既互相勾连又自相矛盾——以及通过能动的消费在母体之中连接在一起。我认为,必须通过所有这些要素理解电视,因为日常生活也是通过这些要素形成的。

然而,在我的论述中可能有矛盾之处,这一点需要详细阐明。这个矛盾在电视自身。ESRC PICT(即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会支持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研究项目)是在对家庭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研究中形成的。我认为,电视不再是孤立的媒介技术(如果它曾经是),它现在迅速地嵌入到技术与媒介正在汇合的文化之中(也包括计算机与电子通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具有过渡性。电视是这本书的核心,这无可否认,因为电视仍然是我们的核心——我们感兴趣的电视的权力、电视的影响和电视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等许多问题,其核心仍然是电视。

但我也自知这本书讨论的议题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历史遗物:在电视技术与它的规则内外出现的巨大变化,已经让我所说的变得离题万里而且很不准确。这是可能的。前提是如果你能相信现在和将来一整套的传播体系——个人化的、破碎的、尽可能疏离的——的确就像文化炸弹一样冲击整个社会,在生活、人类与世界的柔软而脆弱的组织中炸开一条血路。但正如我所论证的,新的技术形式不会被简单地吸收,而它面对日常生活时也不会保持原样。那么,将来某种媒介政治必须认识到,在媒介环境的差异性与侵入性迅速增长之时,安全性与创造性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即使这一点很显然是越来越难以做到了。

目 录

前言	1
1 电视、本体与转换客体	1
2 电视以及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34
3 公共领域的郊区化	76
4 电信—技术系统	115
5 电视与消费	155
6 观众研究	196
7 电视、技术与日常生活	236
参考文献	263

1 电视、本体与转换客体

(人们)能够适应任何东西,只要他的想像力可以妥善处理这些东西;但他们处理不好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因此,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是那些源自自然、世界、社会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的象征之物。

(Langer, 1951, 287)

我的电视,在心里我是要带着你一起走的。我爱你。

(在纽约,一个名叫吉尼罗·加西亚[Genero Garcia]的学生在父亲不让他看电视后开枪自杀,这是他的遗言。《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20.2.83)

近来(以及不那么近)的社会生活理论强调社会是抵抗焦虑的防护线。解决秩序这个经典问题就可以看做是这一类的防护线(虽然并不一定是以这种方式出现)。这个防护线,必然是建构在个人、机构与社会的这些现实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秩序的支撑——秩序显现在各种各样的传统、仪式、常规以及想当然的行动中——在这里,有点矛盾的是,我们要倾注大量的精力,作出努力并且要调动认知和情感的资源。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我们要避免大的恐慌,建构并维持我们的个性,在时间与空间中精心调配我们的社会关系,分享意义,履行责任,

体验快乐与痛苦;我们的满足程度和控制力大小不等,但是会尽量避免杂乱无章的威胁所带来的盲目的恐惧。家庭、家族、邻里、社群、国家(社会与技术不断变化的结果,是使得国家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它也越来越多地向着挑战开放)这些机制,我们定居其中并需要我们的努力维持,它们既是我们维持这个防护线的载体,也为我们维护这个防护线的能力提供资源。这种能力又扎根在我们的能力中,在日常生活的活动范围中保持着事物呈现给我们的连续性和可依靠性,并尽可能在我们自身与各种各样对连续性的威胁之间营造一定的距离,或者完全否定他们,或者把它们吸收,并以某种方式编织进日常生活的结构中。

在当代世界,来自杂乱无章的威胁以及我们对抗威胁的能力,都随着工业与技术的发展而增强了,这一点常见于诸多讨论中。当代世界,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是一个“空间—时间距离化”(space-time distanciation)(参见下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以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 1973)称做“生机勃勃的在场”(the vivid present)为基础的前现代世界各种关系解体了:家庭内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控制的、相对来说变化不大的空间与时间这些都不存在了。这是一个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世界:它的不安定既来自于核威慑、自然环境的灾害,也来自于人们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紧急关头前表现出的脆弱,以及一个不稳定的传播体系的内在矛盾,这个传播体系使得我们或者与世界同步联系或者与世界失去联系,而如果没有这个传播体系,世界就完全与我们无关了。

的确,也有人这么认为:当代世界一直处在剧烈变动中,只是在这个时代它的变动是由媒介与信息技术共同造成的,这二者带

来的变化体现在政治(全球化政治的出现与地方主义、区域主义的复苏)、经济(大众消费品的重组与消费者权力的激增)与文化(大众传媒占据了主导地位,幻想与现实的坚固防线也溶解开来:这就是超现实)中。

在这一章,我要考察电视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中的立足之处。我要把电视看做是一种本体和现象的现实来讨论,当然这二者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电视具有真正的日常性。这样一种技术与媒介是怎样深刻而密切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的?它是怎样巩固自己的位置的?我相信,一个人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理解日常生活本性的方式;而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尽管不太完美)又必须以理解其自身的可能性为前提条件:这是由于可能性的前提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现象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我在描绘和某种程度地综合它们的解释时,会尽力描述出我必须称为电视的经验:电视在日常与功能中的经验。

第二,必须认识到在研究中有严重的裂隙。近来对大众媒介的研究所作的评论,认识到了理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因素的必要及其难度;这些因素,普遍地都参与到大众传播的过程中,有的还特别地参与到媒介接受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包括: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他的心理状况,他利用媒介的一般习惯、希望或相信利用媒介获得的益处,以及个人选择或评估媒介的相关活动,当然还有与此相关的其他要素(McQuail, 1987, 25)。然而问题是,我们不仅仅要识别这些要素,也不是要把它们作为孤立的现象分别研究,而是应该找到一个框架,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与此相类似的评论,倾向于把媒介接受的动力从它的社会

环境中抽象出来。大多数的研究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有些研究即使认真地考虑了社会环境,也没有对媒介融入日常生活结构中的方式提供理论描述。当斯蒂芬·希思(Stephen Heath)说“它与社会毫无二致”(Heath,1990,267)时,他既没有认清媒介的普遍意义,也没有认清电视的特殊意义。日常从这里逃走了,在逃亡过程中电视也逃走了。

在这一章中,我要从一个基本的层面接近电视;看上去这是可行的而且有理由这么做。看电视、讨论电视、阅读有关电视的东西,这些事情时时刻刻地发生着:不管你的注意力是集中还是不集中,也不管你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电视伴随着我们起床、吃早餐,伴随着我们饮茶或在酒吧里喝酒。它在我们孤独的时候抚慰我们;它帮助我们入睡,给我们带来快乐,也带来烦恼,有时也向我们提出挑战。它提供的机会既让我们社会化也使我们孤独——虽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虽然我们也必须学会怎样把媒介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Spigel,1990;1992),但我们现在完全想当然地接受了电视。我们接受电视的方式有点像我们接受日常生活一样自然。我们(某些人)想从那里得到更多东西;我们也会抱怨它(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看它);但我们不是太理解(或者我们不觉得需要理解)它是怎样工作的: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Hall,1977,325)。我们的电视经验是世界经验的一个部分: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也不是我们所能想像的,否则那就太有趣了(Schutz,1973,229)。

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

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

在那些关注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动态的研究中,有一些解释了这种彻底性;尽管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接下来我要引用一些这样的著作,我认为这些著作对研究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对在电视经验上施加了自己的影响)有所贡献,这些著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三把钥匙。第一个是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他在描绘社会结构的特征时,描绘出了意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在这本书中会关注他提出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问题。第二个是温尼克特(D. W. Winnicott)从心理学角度描述的“个体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the individual)的问题,尤其是他对转换的现象与潜在空间的探讨。第三个是某种程度的综合研究,我将探讨一些关注社会生活中各种仪式的著作,尤其是那些与传统、仪式、神话有关的著作。

小心谨慎是必然的。以这种方式开始探讨电视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即关注我称之为基本的或基础的社会现实,很容易变得简单化和本质化。你可以这么读解:它声称电视现象的所有因素都可能(必须)与社会现实这个层面相关;你也可以这么读解:它暗示对复杂的社会与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不在行为与文化变异的领域,而是在物质与生物必然性的浑浊之域中。这样,它就成为讨论电视的简单步骤,好像电视满足了人们某些基本需求(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电视是这样的)和社会功能(同样它也做了)。但它暗含的意思是说,我们只在电视不变性中观察电视;我们将会承受把电视看

做铁板一块的谴责,因为我们说电视已经深刻地嵌入到社会中,它不再变化,也不会变化。

这不是我在这一章或在整本书中预期或希望的。当然,我对人类天性的假设为讨论的基础,它也构成了对大多数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基础,虽然这一点通常都是被很好地隐藏起来或者不加以说明的。我认为,电视已经殖民到了社会现实的基本层面中,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它。不理解它,我们就会错误理解它的权力基础,而且还会错误地判断改变它或控制它的难度。但同样,对社会现实这个基础层面的关注已经出现了,我保证,这正是由于社会与历史现况正在威胁着它们的结果(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我并不是在暗示,因为电视已经深刻地嵌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它就无能为力了,也不是说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更实质性的因素对理解电视的意义不具有同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恰好相反,正是因为电视是如此深入地嵌入生活中,正是因为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自身是如此强烈地融入到电视之中,我们必须把现代社会中的媒介看做是一种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权力——更好或者更坏。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会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电视与本体安全

为了解释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一个整体的规划,“本体安全”是其理论基础中的一个核心部分。他把这一理论称为“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其起点和终点都是社会学中最常见但也是最难以解答的核心问题:结构与代理(agency)的问题。我不打算全面地、透彻地讨论这本著作。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提炼某个观点时,由于破坏了它的上下文,这样就有可能改变或破坏了其原意,对此我深感抱歉。

吉登斯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说明了什么是本体安全：

(本体安全)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体现在大多数人自我确认(self-identity)的连续性中,以及人们在社会与物质环境的行动的可靠性中。对人和物的依赖感,这是信任这一概念的中心,是本体安全的基本感受;因此,这二者在心理学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本体安全必然与“存在”(being)有关,用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在场”(being-in-the-world)。但与其说它是一种认知,不如说是一种情感,并且它是植根于人的无意识中的。

(Giddens, 1990, 92)

在吉登斯的“规划”(Giddens, 1989, 279)中,有许多与此不太相同但同样重要的要素。下面我就来讨论这些要素。

首先,在本体安全与信任之间有着必然的交叉,这种交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也同样是根本的、普遍的。吉登斯说,在我信任你之前,我必须信任我自己。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信任自己需要一个学会信任他者的发展过程。“我——作为对象的我——你”之间互为影响的过程是社会构造的基础(吉登斯近期出版的一本书以此为书名),准确地说它是所有社会的基础;传统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对此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米德[Mead],库利[Cooley],埃里克森[Erickson],莱恩[Laing],温尼克特[Winnicott]等人)。但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不是抽象的,其本体诉求也不只局限在一般社会理论的伦理范畴中。因为如他所说,信任与本体安全都是能动参与的产物,是在日常生活的事件、规范与联系中能动参与

的产物。这种能动的参与是物质性的,它需要身体的在场、面对面的互动行为、交流以及语言;它也是认知性的:它需要理解、记忆、反应以及清楚的时空感;它也是感性的:因为我们与客体、与其他人以及与象征符号的联系的基础在无意识领域中,但是,这种联系只有依靠从经验中得来的对世界的确定性的信心——这是某种信仰。说它是信仰是因为信心必须依赖(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在时间与空间中回应与自己分离的他者的安全感”(Giddens,1989,278)。

信任,是本体安全的前提条件,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能力控制焦虑行为的前提条件,它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体系的信心,在一个结果与事件都设定好的体系中,信任表现为一种信仰,信仰他人的正直与关爱,信仰一种抽象原则(比如技术知识)的正确性”(Giddens,1990,34)。反过来,这种信心暗示着控制、对付,或者把对我们提出挑战的各种(针对个体的与针对集体的)威胁与危险最小化。这就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

个人与集体的信任能力是培养的结果(见下文)。但它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固定行为中得以维持;这种行为,需要人们持之以恒的关注以及老练的(尽管这一点有点想当然)技术:

这本书和其他的一些书,关注的是日常谈话与交往中的琐碎小事,它们强有力地指出,人们在形成基本信任(basic trust)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不只是一般性的合作、待人诚实以及获得相应的报偿,同时还会掌握从实践中得来的极端老练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持续性的保护措施(虽然在其中也可能满是裂隙与断裂之处),用以对抗与他

者相遇时也许是极其偶然唤起的内心焦虑。

(Giddens, 1990, 99)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维护本体安全的社会环境与前现代社会非常不同。社会与技术变化的结果,是削弱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重要的联系,使得面对面的交流反而需要以抽象的符号或专业知识为中介,由此引发的本体安全是时空距离化的一个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越来越少地依赖亲属关系,同一地域(邻里或社区)之间的关系再也比不上日常资源与供给的重要。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与机器,而这些东西,我们既不知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也不觉得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模式中占据了一部分。钞票、空中旅行、媒介的内容,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被我们信任。它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它们被信任是理所当然的。吉登斯认为,我们学会(好像是学会了)“信任来自远方的东西”(trust from a distance)是源于我们的童年经验。但这种能力极易受到威胁,这威胁不仅来自自然的灾难,而且源于社会中的危险。吉登斯还指出,我们对这种新的“抽象物”的信心以及对机械主义的信任越来越少,“绝大部分不是因为心理上的满足”(Giddens, 1989, 279)。

吉登斯所说的社会模式是以空间与时间、在场与不在场的辩证关系构成的,也是由惯例构成的,这些惯例的出现及维持又是为了维持以上的辩证双方。这些惯例可以保护个体与集体免受焦虑的困扰,而焦虑总是伴随在危机左右的(准确地说是焦虑决定了危机)。

在叙述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有意识的行动以及日常生活的惯例之间的联系时,吉登斯引用了大量的社会学与精神分析的